



“玉飞凤精神”与无锡现代化关系分析

刘建平

2008年4月公布的无锡市徽标,鸿山墓群出土的“玉飞凤”成为图案主角。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2500年前的“玉飞凤”超越了历史和特定文化的边界,“定格”了现代无锡人的“集体意识”和核心价值,成为城市精神的代表。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无锡市民和“玉飞凤”的这一次“相遇”既恰逢其时,又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不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还是在全国发展或长三角一体化格局中,无锡都到了一个应确立更高目标和酝酿新的发展动力的阶段。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一种被普遍认同、又深入人心的城市精神其价值难以估量。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鸿山墓群一些“谜底”尚待澄清,“玉飞凤”的本来面目也有待明朗,无锡与“玉飞凤”的历史性遇合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30年,“玉飞凤”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无锡的现代化,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本文将就“玉飞凤文化意象是什么?玉飞凤与无锡人集体心理奥秘以及玉飞凤精神与无锡现代化关系”等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玉飞凤”文化意象分析

(一)从中国凤文化看“玉飞凤”。很明显,“玉飞凤”与中国“凤文化”一脉相承。“凤”是中国起源最早、底蕴最深厚、世俗化程度最





高的祥瑞符号之一。中国最早的一些典籍,如《尚书》、《山海经》、《诗经》中都有关于凤凰的记载。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不少地区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凤凰”遗迹或实物。如湖南洪江高庙文化曾发现距今 7800 年前陶罐上的凤凰图案,长沙发现过 7000 年前的凤凰图案,浙江河姆渡文化中曾出土 6700 年前象牙骨器上的双鸟纹形象,被认为是古代凤凰的雏形。古蜀国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及商代(殷墟)妇好墓都有“凤凰”文物发现。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中国秦汉以后各历史时期的“凤凰”形象,都与这些早期遗存一脉相承。事实上,经数千年演化积累,凤凰在中国文化中完成了自己的意象定型,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可表征民族文化心理的稳定含义。如“凤凰来仪”、“凤凰和鸣”、“凤鸣朝阳”、“百鸟朝凤”、“龙凤呈祥”、“梧桐栖凤”、“龙驹凤雏”等。它们或源自原始图腾,或象征天下安宁、太平盛世、和谐生活,或被人格化,特指帝后、君子、才子、佳人等。所有这些“意义”都指向“吉祥”、“幸福”及“高贵”,足见“凤凰”8000 年来一直承载中国人的某些核心价值,关联着民族的根本理想,适应着从帝王到普通百姓种种不同的精神需要。当然,这些也是无锡“玉飞凤”的基本蕴意。

(二)从吴越文化看“玉飞凤”。通过区域文化比较可知,吴越文化属一种“重人伦”的文化。商周至春秋时期,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分别是蜀、楚、吴、越四国。将古蜀国的三星堆、金沙文化与楚国文化及吴越地区的马家浜、河姆渡、良渚文化进行比较可发现:三星堆、金沙文化中用于祭祀的场所、器具最多,尤其三星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多为祭祀器具,几乎无生活用品,器物和人物的造型夸张怪诞,原始崇拜的意味浓烈。这些说明古蜀人的生存较大程度上





依附某种非现实对象,“人的自觉”还不充分。楚文化也有图腾崇拜,但楚地风俗最突出的是神话和巫术色彩浓厚,且常糅合于人的实际生活,“人神共处”且色彩缤纷成为楚地生活的文化基调。民间繁多的神话传说,楚辞中的丰富想象、离奇构思及“巫”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以及漆器、丝织品中无处不在的神兽神鸟,既是楚人丰富想象力的体现,也反映楚人意识中“人”还处于偏离中心的位置。与蜀楚文化不同,吴越地区早期文化遗存展开的是以“人生为轴心”的农业文明图景。如马家浜文化(距今 7000~6000 年)出土了稻谷、米粒、稻草的实物,以及大量农具,包括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还有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的遗迹及渔猎用具、房屋遗址等。河姆渡文化(距今 7000~5300 年)、良渚文化(距今 5250~4150 年)中也有大量农业、渔猎和生活用具,尤其稍晚的良渚文化中发现黑陶炊具以及鼎、豆、盘、双鼻壶、尊、簋等食具,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趋于丰富精致的轨迹。良渚文化等遗迹中也发现一些祭祀器物,但在发达的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中,其祭祀只能是仪式化了“人”的生活诉求。

上述特征在 2500 年前的无锡鸿山文化中得到印证和发展。鸿山 2000 多件文物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以玉器为代表的佩饰类器物,另两类以青瓷为主,即礼乐类器具和酒食类器具两类。很明显,这三类文物要么是生活原物,要么是对生活原物的仿制,总的特点是对活人生活的模仿。如佩饰类反映人的精神生活,以理想为依归;礼乐类模仿贵族的政治生活,以周王朝制度为范本;酒食类器具则复制日常生活,以奢华排场为特色。其次,鸿山文化也出现被有些专家认为是“蛇图腾”的情况,但即便是,这些青瓷器具上的





“蛇”，与江南水稻田里常见的“水蛇”毫无二致，因而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是吴越文化写实性的又一见证。还要注意的，鸿山出土的“蛇”只是重要器具装饰，是次要角色，如被安排在编钟编磬的底座上，远未处于中心位置。总之，鸿山墓的葬制反映墓主企图保有生前原样生活的愿望，葬物则再现与墓主身份相称的生活内容，凸显了“重人伦”的吴越文化本色。

“玉飞凤”就是这种“人为中心”的文化产物。

(三)“玉飞凤”基本特征分析。

1. 艺术特征：写实与理想合一。鸿山出土的玉器“龙”、“凤”兼有。“凤”主阴，根据其形制和孔洞凹槽的位置，“玉飞凤”极可能为贵族女子发髻饰物。与三星堆文化的鸟形祭器或金沙文化的“金箔凤凰”比，鸿山“玉飞凤”没有原始崇拜色彩和神话韵味，没有怪诞的夸张变形，其匀称的体形，细洁的羽毛和符合鸟类解剖结构的脚爪，就如大自然中一只真正的鸟，完全在人的经验之内，风格非常写实。此外，与马王堆汉墓帛画中有些张扬的“凤”比较，鸿山三只“玉飞凤”造型都是娴雅柔美、极富动感的“W”形，雕工精细逼肖，气象安静平和。尤其是选为城标的一枚“玉飞凤”，舒展大气，从容庄重，呈现出纯洁、高贵、完美的理想风格。

2. 文化特征：“玉”、“凤”文化叠加。据专家测定，鸿山墓群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472 年，距今约 2500 年。而江南玉器已有 8000 年历史，河姆渡文化中的“象牙凤”距今亦已 6700 年。可见鸿山“玉飞凤”至少层积叠加了 4000 年以上的玉文化和凤文化。就玉文化看，其凝聚了“高尚德性，永恒长久、纯洁无瑕、稀有珍贵”的意义；从凤文化分析，它则有“吉祥、永生、高贵、完美、纯洁、光明、自由、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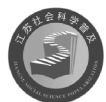


等意义。如此看来,玉文化和凤文化的意义大多相通,且都具有永恒性。两重文化的叠加,使“玉飞凤”的文化意蕴站到了中国文化的高峰,集中了中国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若干核心价值。

3. 人格特征:完美与永恒融合。如前所说,吴越文化“以人为中心”,因此“玉飞凤”艺术和文化特征从根本说都是吴越地区的人格特征。艺术特征使人格超俗,文化特征助人格定位。在玉飞凤表象之下,实际是高度抽象化了的两种人格意识,一种是艺术所凸显的人的“完美”的“自我认同”,面向当下;一种是文化所呈现的人的“永恒”的“生命理想”,面向未来。可见,“玉飞凤”的人格意蕴才是其被置入墓葬的理由。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玉飞凤”的人格意象,是吴越地区客观的“集体人格”在设计或需求者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虽然其出于贵族墓葬,但却是以吴越地区全部生活为背景、反映了整个地区的人格向往,或者说是吴越地区“人的存在状况”的某种折射罢了。

二、“玉飞凤”与无锡市民“集体心理”分析

(一) 无锡人内心渴望一段与现代无锡文明相匹配的历史事实。需要一个能诠释当代无锡的、原初性的历史理由。这实际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历史是自信力的源泉之一。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集体的人”,都期望了解自己的过去,也都期望自己的过去优秀出色,这是用历史肯定、激励自我的普遍心理。司马迁《史记》虽记载了“泰伯奔吴落脚梅里”,但泰伯原籍中原,奔吴后并不专属无锡,而是属于整个江南。其次,泰伯作为“三让王”,是“尚德”的丰碑。“玉飞凤”则为无锡本土所出,根由清楚。更重要的是,“玉飞凤”主





要喻示“美与完美”，是“美”的极致。如果说江南早期文明“以人为中心”是一种“求真”文化的话，那么从泰伯的“至善”到玉飞凤的“至美”，无锡 2500 年前的历史就已经是一个人类文明三大要素齐全的历史。如果这让我们有理由说现代无锡是从这样一个历史中走出来的，一定更符合无锡公众心理。所以，认定“玉飞凤”为城市早期史的一部分，是从“美”的高度刷新、完善了无锡历史，是无锡现代文明的历史印证，它满足了无锡人一种诉诸历史的、且与现代无锡发展相吻合的公众集体心理期望。

(二)面对未来，无锡人需要一种新的自信以应对“现代化焦虑”。改革开放 30 年，无锡的进步为世人瞩目，市民在心理层面上也大大提升了“现代化预期”，即对无锡成为国内“一流城市”的预期。但与 30 年前比，无锡内外环境大变。如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中西部发展加速，东部城市差距缩小，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剧，竞争环境愈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事关未来的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诸如“无锡还少什么？20 年、50 年、100 年后，无锡到底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无锡发展的新动力、无锡人新的精神力量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无锡人“现代化心理焦灼”的反应，其实质是过去 30 年的经验已经不够用了，适合无锡的力量之源尚须探索。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尽快为无锡找寻新的“价值坐标”。

中外历史证明，社会进步加速或人的存在方式发生巨变，一定是在找到新的精神力量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及国内改革开放经历的数次“思想解放”均如此。一般来说，人类寻求精神力量有三条途径：一是向未来寻求，如为社会进步设定目标





值；二是向“当下”寻求，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三是回到历史源头去寻求。就世界城市史的普遍现象看，有历史源头可回溯的城市往往比较幸运，因而在城市历史中寻求“城市精神”常常是“不二”的选择，但前提是“有历史可回溯”。无锡人很幸运，鸿山墓葬给城市提供了某种胜过语言的历史源头，而“玉飞凤”正是无锡人在其中想寻求的东西，它让无锡人看到了城市文化之根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到了城市的记忆及未来。所以，无锡将“玉飞凤”立为城标，实质就是在最需要和最关注“城市价值”的时候，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坐标和城市理想”，新的自信由此建立。

（三）通过“玉飞凤”，无锡人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定“玉飞凤”为城标的过程，是无锡人意识形态的调整优化并作出决断的过程。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把人们作出各种判断，得到各种观念的意识活动过程描述为本质的还原。胡塞尔认为：“人们作出判断、得到观念是意向积极活动的结果…意识有一种综合出一个完整的对象的作用。”胡塞尔把这种显现在意识中的对象称为：“本质…，现象学…把它们的结构还原到各种基本的意向，以了解心理现象的本性，理解心灵之为心灵。”（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现象学条目）无锡确定城标的过程中其实有多项选择，但最终确定“玉飞凤”，原因是找到了一种能够植入无锡公民心灵的未来城市意象。用现象学理论看，这个“意象”就是无锡人自己的“集体本质属性”。“玉飞凤”迅速为无锡各界普遍接受，就是最好的说明。前面说过，玉飞凤主要喻示美。现代无锡人对玉飞凤的发现，其实就是对自己所应有而未有的东西的发现，也与过去30年无锡发展注重“富”而忽略“美”有关。就人和社会的本质而言，“美”发自人的内心甚至本能，是和谐





社会的极致,是一种比“德”更深刻、更终极性的东西。选择了玉飞凤,就是选择了美,无锡人正是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确认了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三、“玉飞凤精神”与无锡现代化进程

(一)切实打通“玉飞凤精神”与“无锡现代化”之间的联系通道。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无锡正处于一轮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转型”之中。但转型中矛盾众多,任务繁重,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倾向并不少见,给“真正的转型”及转型质量带来障碍。一些地方虽注重用“玉飞凤精神”引导实践,但因解读不透,“玉飞凤精神”较多停留在文化标签和口号的水平。实际上,“玉飞凤精神”内涵是“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到和谐美好的最佳境地”,它既与中国文化理想一致,也与联合国各种人文标准一致,应该也成为“无锡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人的生存状况涵盖人生许多方面,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环境到社会保障,从教育到娱乐,从个人发展到社会公平正义等,这些都是现代化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可见,“玉飞凤”与“现代化”之间完全相通。就当下看,对于无锡的现代化进程,玉飞凤有三个实际指导意义:①发展模式转型。切实从主要“以经济指标为导向”转为“以城市理想为导向、多项人文指标制约”的发展模式。②发展价值定型。澄清无锡现代化的理念和目标,以“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和有幸福感的现代化”为新的核心价值。③发展行为变型。各类发展行为更加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未来关系的协调。





(二)发挥“玉飞凤精神”影响力,以长效的“软公共管理”推进城市现代化。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指现代条件下人的精神心态与性格气质,或者说文化心理及其结构……而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可见,“玉飞凤精神”属“现代性”范畴,反映着无锡人的文化心理,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换个角度看,作为城市软实力的要素,“玉飞凤精神”还具有对无锡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广泛包容度,是这座城市的“价值抽象”和未来长期的“价值制高点”。但“软实力”是通过“影响力”作用于人及社会组织的行为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前面说过,城市精神是市民的“群体本质”,是一种天生就能直达人心、触动人心、常驻人心的力量。“玉飞凤精神”要达到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换个角度看,文化精神是一种有充分感召力并能“以一驭万”的东西,它可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提升公民素养,涵养城市品格,形成城市个性化的传播形象等,属于“软公共管理”的范畴。因此,如何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将“玉飞凤精神”作为无锡现代化资源进行长期的管理甚至开发,培育富有魅力的“玉飞凤社会文化”,应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重要课题。

(三)加强对“公众集体心理”的研究。近年来,文化研究的方向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精神研究”。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文化的核心是当时当地人的思想和精神”或“吴文化其核心是指吴地人民的观念意识、人文心态和精神风貌”。这些说法最终都指向“公众集体心理”。因为公众集体心理是千年文化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发展的“反应器”,不但活的文化精神就在其中,而且是“现代幸福指数”的最终受体。“玉飞凤精神”意义重大,就在于其所负载的“永恒性”能





与“现代公众心理”相接。因此,公众集体心理实际是最重要的市情之一,是城市“软公共管理”的基础、对象和精髓。过去 30 年我们比较重视“物”,对人民群众深层次的、活生生的“精神本体”关注不多。这种情况应下大气力扭转。海德格尔谈到人的本质时说:“人是一个在其存在的过程中领会自己的存在的存在者。”这与马克思所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含义一致。公众心理是现实的能动反映。在多元价值共存的全球化背景下,公众心理也必然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变化的。无锡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市民意识的现代化,是市民心理感受的幸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公众集体心理”的研究,应纳入无锡现代化进程的工作范畴。

“现代化”说到底,是如何让市民生活得更舒适、更美好和更生机勃勃。从这个意义上说,“玉飞凤”是无锡人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



刘建平,1954 年 12 月出生,江苏南京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文专业教学工作,2006 年开始关注吴文化现象,向历届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了《吴文化研究方法综述及创新思考》、《吴文化语言群与吴文化本质》、《清代江南经济持续繁荣的深层原因——〈红楼梦〉中江南经济透视》、《“玉飞凤精神”与无锡现代化关系分析》等论文,并主持学校《吴文化与〈红楼梦〉关系研究》课题。

